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汪高鑫

人物志卷

①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汪高鑫

人物志卷

①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上 / 汪高鑫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80-9054-2

I. ①史… II. ①汪… III. ①史学史—文集 ②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 K091-53 ②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652 号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上

总 主 编 杨共乐

本卷主编 汪高鑫

责任编辑 杜晓宇 王 敏 董秀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史学史研究文选》顾问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吴怀祺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向燕南 李 帆 杨共乐
张昭军 汪高鑫 张 越
周文玖 易 宁 董立河

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

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1999年第3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

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被该公司评选为“2015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选辑，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年9月25日

目 录

1	丹仲其 方国瑜教授访问记
10	岳晓峰 王静如教授访问记
18	瞿林东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30	岳 峰 蔡尚思教授访问记
42	孙玉良 道德学术两纯粹——记佟冬同志
58	张 强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日知先生访谈录
68	朱仲玉 王毓铨先生访问记
78	瞿林东 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
89	刘家和 吴怀祺 访季羨林先生

99	张立生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
112	武怀文 史念海教授访问记
120	许殿才 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访陈振教授
131	陈琳国 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学术道路——何兹全先生学术成就概述
145	岳晓峰 邱汉生先生访问记
156	吴怀祺 追寻深义文化的底蕴——访周一良教授
167	岳 峰 吴泽先生访问记
178	张 峰 文风不惯随波转 学海滔滔一钓垂——王玉哲教授访谈录
190	陈其泰 张 越 清史、民族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王钟翰教授访谈录
204	林文勋 李埏教授学术述略

	赵文坦 王晓欣
214	杨志玖先生访谈录
	曾贻芬
227	阴法鲁先生访谈录
	向燕南 杨树坤
236	任继愈先生访谈
	晁福林
246	《尚书》、经学和史学——访刘起釭先生
	汪受宽 邱 锋
258	赵俪生教授访谈录
	周少川
267	治史论学六十年——饶宗颐教授访谈录
	张宏毅
279	耕耘、开拓在美国史的研究领域——访杨生茂教授
	宁 泊
295	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
	顾奎相 陈 浣
305	陈光崇教授访谈录
	向燕南
319	刘乃和教授谈当前历史文献学的研究

- 赵仁珪
- 332 社会、历史与文学史发展规律——郭预衡教授访谈录
- 康保苓
- 338 徐规先生访谈录

方国瑜教授访问记

丹仲其

1982年12月1日和3日，我们趁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来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访问了这位年已八旬、被西方学者称誉为“纳西文化和历史研究之父”的老教授，请他就当前史学工作、治史经验和云南地方史研究等问题，谈谈宝贵意见。方老先生虽然视力不好，但精神十分饱满。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他谦虚地说：“我们云南是边远省份，工作赶不上内地，来这里应该多向北京的同志学习。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讲，只能将我们的工作情况说一说。”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的地方史研究”

方先生说：这次人大会议上，赵紫阳总理谈到了经济建设不平衡性的问题。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就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的地方史研究。我于1932年在北京读完师范大学本科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课程，于1934年到南京，专攻语言文字、目录校勘等学问，后来回到云南从事地方史、民族史研究。解放以后，工作条件好得多了。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这一年的秋天我们开设《云南地方史》课程，由我主讲，印有两厚册讲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们也搞了一个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八年规划。八年之内，主要是做四件事。

首先，是收集资料，编《云南史料丛刊》。这是基本工作的第一阶段。原

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缪鸾和同志，他在1980年去世了。现在除我外，还有两位中年教师。最近又增加了一位资料员，招了一名在职研究生。科学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逐步积累资料。这项工作搞起来才能快一些。从1978年开始，干了四年多，每天写几千字，积少成多，已有600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一堆。去年谭其骧先生到云南，见到了，说：“啊，已经搞了这么一堆了！你们说自己落后，其实是先进嘛！”我视力很差了，既不能看，又不能写，只能动嘴，工作主要是他们几位做的。要说我们有什么经验的话，重视积累资料，从基础工作做起，这算是一条经验。

其次，是搞云南古代史编年。按年代次序把史事整理出来，是初步的研究工作。搞历史一定要注意时间、空间，所以要搞编年史，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第三是写专史。省里的意见是按每个族写出民族史。再按系统写出农田水利史、矿业史、手工业史；文化方面要写文学史、艺术史。云南关于宗教的材料也比较丰富，要写地方的宗教史。解放前有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几乎每一种都没有云南的东西。如文学史，云南何尝没有文学？去年任继愈先生到云南，讲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要写八本，已出了一本。我问他：有云南的材料没有？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人搞出资料。其实佛教的若干派别云南都有，云南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佛教很流行，尤其是禅宗，信仰的人很多。也有信密宗的。云南毗邻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小乘佛教也传到云南。云南有个大错法师很有名，在洱海对面的点苍山传教，信徒很多。晚明时代，佛教尤盛。点苍山以北是喇嘛教，以南则是小乘佛教。陈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是第一次写云南佛教。云南还有许多佛教遗迹，“文革”中红卫兵费了很大力气破坏了，现在文物局拨款修复，谈何容易！

对云南地方佛教史，我过去稍微研究过一点，援庵先生写书时跟我有过联系。1935年我们通过信，援庵先生给我的信是通过陈寅恪先生转给我的，让我为他写书提供资料。当时我在云南通志馆当编辑。抗战期间我还写了篇明季以前云南佛教的文章，请援庵先生指教。当时北平沦陷，通信困难，信件由当时在香港的陈乐素同志转。援庵先生不满日伪邮政检查，他寄信不封口，并在信封上写了八个字：“此信开口，便于检查”，讽刺日伪当局。过去我

与云南佛教史就有过这么一段关系。所以我向任继愈先生说，云南佛教史资料不少，中国佛教史应该给云南一个位置。我认为，中国佛教史若缺少云南的内容，就是不完全的。

还有一幅关于云南佛教的画卷。1944年曾在重庆展出，有五丈长，画有一百三十多尊佛像。当时李根源先生让我对这幅画卷进行研究，我据之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南宋时期云南佛教流行的情况。这幅珍贵的画卷现在台湾，我们以后总还是有机会能见到的。

大理有一座密宗教派的佛寺，周围有三座塔，是南诏时修的。塔的形制与西安的小雁塔一模一样。最近西安重修了小雁塔，完工后工匠转到大理去修。我根据历史记载写了篇文章，供他们修塔时做参考。

以上两项，编年史和专史，都带有长编性质。云南地方史过去不受重视，佛教史上没有讲云南，文学史上没有讲云南，白寿彝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交通史》也没有讲云南。之所以没有讲，是没有人提供资料。作为各民族的历史，云南这部分缺了。我们现在必须做提供资料的工作，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上述几项都属基础工作。这好比是初步开荒，水平是很低的，但其有利方面是很容易做出成绩来，不像有的问题别人研究很多了，不易做出成绩。

第四，是编著云南地方史初稿。计划分上下卷。上卷在上述专史的基础上，写出专题论述，下卷写云南地方史。可以分汉晋为一段，唐宋为一段，元明清为一段。

这里有不少难点。如社会史分期，是个困难问题。边远地区既与内地发展呈不平衡性，又要与全国历史紧密结合。我初步认为，从云南地方历史发展的特点说，汉晋时期可以说是边郡制度。以前劳干曾写过边郡的文章。当时边郡比内地落后，如贵州那时属于夜郎王统治。边郡的太守，职权也和内地不一样，他还管军事，要养兵。有些到边地当兵的人，后来终身就住在那里，成了移民。西南的边郡与西北的情况又有不同，还需研究。唐宋时期可说是边州制度，即所谓羁縻州，以土司为地方官负责治理边州。唐时各地有一千多个羁縻州，包括大理、南诏、吐蕃、突厥等地。究竟当时如何实行管理和统治，还不大清楚。我正指导一个青年同志研究这个问题，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将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对全国范围的共性的问题研究清楚之

后,对研究云南地区的个性问题大有好处。元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土官制度。这一时期云南设立行省,名称和实质与内地基本上一样了。云南从元代开始进入地主经济。明朝在云南实行屯田,设立卫所,这些在云南很显著,与广西、贵州的情况不同。卫所的设置促成了大量移民。

目前各省正在编写地方志。云南修史志可能比其他省更难一些,有些地区或民族的资料很少,越边远越重要的地方资料越少。地方史志怎么修,我看也不能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现在修地方史志,重点应放在近现代。我们几个人主要的研究范围在古代。在这方面,我也愿贡献绵薄之力。一是提供《云南史料丛刊》。二是在教学上恢复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要写出五六种教材。三是培养研究生,有了人才,才能修出地方史志。别的省历史记载大量存在,基础较好。当然,以前的史志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

“中国历史应该以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历史为内容”

接着,我们请方先生谈谈地方史、民族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他说:

我们很需要有一本新的、内容丰富的中国通史。1978年我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听白寿彝先生谈起修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打算,我很高兴。因为据说日本、苏联都写有多卷本《中国通史》。我们中国人,自己要有自己的《中国通史》,作为中国学者,不能等待外国人给我们写历史。这在国际上很重要。当时我就想,现在也这样认为:应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都写进去。目前我们搞资料,感到研究的不平衡性很突出。内地与边地研究工作固然存在着不平衡,边地与边地之间也是不平衡的。西北地理、满蒙史地之学,自晚清以来,学者们已做出许多成绩。但我们西南还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把这些不平衡的东西糅起来,写成一部大书,使之顺理成章,是很艰巨的。记得1963年讨论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讨论稿时,感到书中关于边疆地区写得不少,编著者的意图是要写成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但由于对边疆地区许多问题研究不成熟,杂糅在一起,与别的研究得比较成熟的内容不相称。希望

现在写《中国通史》能尽量避免这种缺点。处理的办法，一方面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研究，填平补齐，向内地研究工作先进的地方看齐，这要下很大功夫。另一方面，对于短时间内不容易研究得深入、取得满意成果的地方，只好迁就眼前事实的不平衡，先按照当前的水平把书写出来。

我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确实痛感到边疆地区研究的不平衡。五十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冯家昇先生写有《维吾尔族史史料简编》，书名起得很客气，只是史料的简编。1954年我写有《云南民族史》，从书名看，是高水平的。可是看了冯家昇先生的书，我自觉很惭愧。他这本书虽名为史料简编，实际上却是研究性的，这与西北史地之学前人提供的基础好有关系。我们至今还未达到这本书的水平。云南地方史的资料是有的，要经过许多研究，收集、整理的工作要一步步来。我写云南民族史时，自以为掌握了。我从1934年至1954年，学习云南地方史有20年时间，中间参加云南通志馆，其中几门是我执笔，其他部分我也参加了讨论。到1954年，我以为对云南地方史掌握了，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阶段写下来，以为有科学性，而没有考虑到云南资料的基础差，我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也还不高。

我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性问题。以前我曾写过文章，现在觉得这方面还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

去年在北京西山举行了民族史学术会议，讨论到中国史的范围。有一种意见认为，要以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版图为范围。过去封建史家对边疆少数民族是歧视的，宣扬“异内外”“夷夏大防”的反动观点。现在把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当然比旧史家进步得多。

孙祚民同志则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有时强盛，有时衰弱，疆域时大时小，写中国史若是按今天中国的版图为范围不合适，应该按各王朝的版图来叙述中国的历史。

我不赞成孙祚民同志的意见。我在1963年就写文章批评了这种意见，我认为：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王朝的兴亡不等于中国的兴亡；王朝分合也不等于中国的分合。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只是中国境内三个分立的地方政权，并不是中国变成了三个。十六国时期也只有一个中国，不是中国分成了十六个。

援庵先生写《通鉴胡注表微》，就是表彰胡三省主张统一的爱国思想。

中国历史不能以王朝为限制。对于“统一”应该分别两种情况来理解，即政权统一与版图统一。从版图说，我国的版图从来没有分开过。秦的统一是政权实现统一，不是版图统一，十六国时中国的版图仍是一个。隋的统一也是政权的统一，不是版图统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版图也只有一个。

白寿彝先生在建国初年就写了文章，明确提出不赞成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范围，主张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究有史以来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并说，这样做，才能使本国史变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使本国史具有丰富的内容。何兹全先生也认为中国史应以今日中国版图为范围。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那种以历代王朝疆域为范围的说法，那么，在三国时代，又应该以魏、蜀、吴中哪一国作为中国的历史呢？外国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唯一的边界，中国的边界从来是变动的。我们对此不能不引起注意！

有的同志说，台湾至康熙时才属于中国版图。但我们更应看到，在中央政府势力未达到以前，是高山族在开发，高山族是中国五十多个民族中的一个，所以高山族的历史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历史当然应该包括高山族开发台湾的历史。

云南的例子更明显，秦汉时期就与内地有密切的联系，当然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至于远古时代，可能未有人类居住，或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不能从中国疆域分出去。分出去又属于谁呢？我写过《中国西南地理考释》，书中涉及元、明两朝势力达到的缅甸的地区。明永乐年间，缅甸除它的阿拉干地区的一部分以外，都是明朝建立宣慰司的地方，共有八个宣慰司。我的书中把这些现在不属于中国版图的地方作为附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合适。究竟怎样处理好，我还希望再听听大家的意见。

总之，我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以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历史为范围。范文澜同志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以汉族为主体”是统一的一个条件。我对这个提法有一点修正。有主体，必有从体，这个说法不甚恰当。我觉得改为“以汉族为主干”更好，其好处有二：一、说汉族为“主干”，其他民族则为“枝干”，表明各民族都是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主干与枝干紧紧